

社会学是如何证明“受害”的

——饭岛伸子的 SMON 药害调查*

友泽悠季,著¹;高娜,译²

(1.日本京都大学,日本 东京都 171-8501;

2.东南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本文通过追溯日本公害和环境问题研究的先行者之一饭岛伸子的学术形成史,尝试回答对环境社会学而言何为“受害”。饭岛伸子最初从事研究时,社会学界尚未形成关注“受害”的方法论。她对“受害”的发现及具体论述分为三个阶段:在大学与“现代技术史研究会”之间穿梭的时期、SMON 药害患者调查时期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环境社会学”制度化以后的理论拓展时期。作为日本环境社会学初期的理论成果,饭岛伸子的“受害结构分析”适用范围容易被认为仅限于已发生的公害和环境问题,但是从她描写的“受害”中的“不可视”部分特别是支撑生活的家庭关系中存在的痛苦,可以看到“加害”与“受害”的交错。这一视角对于那些身体损害尚未凸显以及不具有区域限定性的潜在性公害和环境问题而言,同样具有分析效力。

关键词:公害;受害;受害者;社会性灾害;饭岛伸子;环境问题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4)02-0040-12

一、环境社会学与“受害”

1. 饭岛伸子: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开拓者

在日本,“环境社会学”作为一个学问领域已形成 20 多年。从创始到现在,对环境社会学而言,在公害^①(pollution)和环境问题中何为“受害”一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公害和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如何把握“受害”就成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即使关注的事例有所不同,但这一视角已经成为公认的方法论^②。

这一视角之所以长期受到重视,原因之一是饭岛伸子(1938—2001 年)的存在。在 20 世纪 60—90 年代,饭岛伸子以公害、劳动安全事故和药

害为中心,通过大量的个案来研究“受害”,并构建了“受害结构分析”^[1]这一独特的理论。饭岛伸子在 1992 年日本环境社会学会成立时担任会长,并被海外研究者称为“日本环境社会学之母”^③。日本环境社会学当然不是由饭岛伸子一人创设,但作为先行者,她所积累的学术识见成为日本环境社会学的重要根基。

然而,饭岛伸子不是最初就具有着眼“受害”的方法论。它是在饭岛伸子与数个情境的不断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早川洋行曾因关注居民运动而探讨过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如他所说,理论的提倡者不一定在该理论内部把自己的实证研究都进行定位^[2]。我们不仅有必要推敲这一方法论的

* 【收稿日期】2013-12-21

【作者简介】友泽悠季,女,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PD/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公害·环境思想史、环境社会学。高娜(1978-),女,天津人,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①本文所说的“公害”、“环境问题”基本上是指由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引发的物理、化学、生物现象使人类生活受到威胁的事态。有关两者的区别及用法,应结合时代背景详细讨论,但在此没有足够的篇幅做深入探讨。

②在理解当事人的行为时,即使是与身体受害、环境破坏无关的事例,也需要注意他是如何认识受害或破坏的,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参照鸟越的总结,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生活者の立場から考える[M].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参见 1998 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上 Dunlop 的发言。満田久義.环境社会学の母、飯島伸子先生.环境問題とともに[M]//飯島伸子先生記念刊行委員会.飯島伸子先生追悼文集,2002:133-135.

清晰模式,而且需要从理论提出前的作品中把握其核心研究视角的形成过程^①。

2. 饭岛伸子的学术轨迹与两个质疑

1960年,饭岛伸子从九州大学文学部毕业后来到了东京,先在一家化工企业(现在的日本Parkerizing株式会社)工作。到大气污染不断加重的东京都中心上班、与技术工作者结婚、所在的制药厂发生了劳动安全事故等这些事情的重合,促使饭岛伸子在1965年参加了名为“现代技术史研究会”的自发小组。该小组以星野芳郎(1922—2007年)为中心,汇聚了自然科学背景的企业技术人员和大学的研究者,当时频繁去水俣市活动的宇井纯也在其中^[3]。他们向饭岛伸子建议,“公害”研究需要社会科学的视角,而其中的宇井纯发挥了饭岛伸子导师的作用^②。恰在那时,东京大学面向一般市民举办了以“公害”为题的讲座,饭岛伸子在聆听了农村社会学家福武直的演讲后深受感动,决定参加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然而,考上研究生也并不意味着找到了研究“公害”的捷径。饭岛伸子开始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与“现代技术史研究会”这两个场域中往返穿梭,她经常会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公害”能否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社会学”(的方法)在揭示和解释“公害”问题上是否有效?关于前者,由于一般认为“公害”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饭岛伸子经常要面对它作为社会学的对象是否合适的疑问^[4]。至于后者,关于各种科学对深受“公害”之苦的人们到底有何作用的讨论持续不断,社会学也逐渐成为争论的一部分。

面对两个质疑,饭岛伸子逐渐确信,各种各样灾害的“根底”与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和科学技术之间有密切关系。但她当时的关注点是受害者和防患于未然人们的抵抗这一看得见的现象。她开始具体研究“受害”始于20世纪70年代参加的SMON药害调查。在长达八年的患者调查中,“受害”的概念逐渐细化为多个层次。

3. “公害”与“环境”的分水岭

在二战后的日本,有关“公害”与“环境”的舆论变化存在两大分水岭。与之相应,饭岛伸子的研究氛围也在发生着变化。

第一个分水岭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媒体对“公害”问题的报道过热,以致被称为“公害热潮”。在此之前,“公害”一词主要用于国家、地方自治体(政府)的行政领域,但到了此时,各大报纸争先报道“公害”,书店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公害类书籍,此种现象曾被称为“公害之秋”^{[5]⁶²},仿佛它是才出现的,这令饭岛伸子感到吃惊^③。1977年,饭岛伸子发表的《公害·劳动安全事故·职业病年表》^[6]虽然形式上是并不面对普通读者阅读的年表,但也摆到了书店里并受到了民众的好评,甚至获得了第4次东京市政调查会藤田奖,想来也与70年代初社会大潮的余波相关。

第二个分水岭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地球环境热潮”。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里约峰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而大约从1988年开始,日本的媒体、企业和政府已经倾向于使用“地球环境”一词,以前在地方层次所说的“环境”则成了国际间政治角力的对象^[7]。也正是在同期,日本社会学会举办了一次公开征集专题的盛会,促发了“环境社会学会”的创建。虽然以饭岛伸子为首的学者们此前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正是在此次浪潮的影响下,才正式亮出了“环境”大旗。

4. 未完成的受害结构分析

在两个分水岭之间的20世纪80年代,饭岛伸子一直抱着这样的疑问:“我所研究的问题真的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吗”^[8]?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虽然各地依然存在着反公害运动,但报道热潮却逐渐冷却,而饭岛伸子对“受害结构分析”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环境问题与被害者运动》(1984年)^[1]在出版后也少受关注^④。

^①笔者曾进行过此项工作,本文主要是比较饭岛伸子的硕士论文与传统社会学的差异,以发现其独特性,并分析它与“受害结构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的拓展过程的关系。参见:友澤悠季.“被害”を規定するのは誰か:飯島伸子における“被害構造論”の視座[J].ソシオロジ,2007,51(3):21-37.

^②饭岛伸子在九州大学所学的专业为社会学,其毕业论文(工藤是饭岛伸子的旧姓)是文献研究,与她后来的关注点及手法相去甚远。参见:工藤伸子.中産階級に関する社会学の一考察[D].东京:九州大学,1960.

^③参见饭岛伸子(1977年)的序言。“公害”这一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国家、地方自治体和大众层面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与现在相比内涵更丰富,对此我会另找机会详细探讨。参见:飯島伸子.公害・労災・職業病年表[M].公害対策技術同友会,1977.

^④据目前所知,只有《朝日新闻》(1984.11.27)做了报道。围绕饭岛伸子当时进行的有关美发师职业病与顾客健康受害调查的独特意义,笔者曾经在日本环境社会学会第42次大会(2010.12.05)上做过报告。

可是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出乎饭岛伸子本人的意料,她在“环境”热潮的聚光灯下成为了引领环境社会学的火车头。背负着将新的学问体系化并表述其独特性这一重任的饭岛伸子,被迫应对新的问题,也即“公害研究的视角如何具体运用于地球环境时代的环境问题研究”^[9],换句话说,如何将“受害结构分析”嫁接到“地球环境”的框架之中。

正如中村刚治郎所批评的,饭岛伸子对“地球环境问题”的把握,存在着过于匆忙地联结“地域”与“地球”这一欠缺说服力之处。近年来出版的环境类教科书中会频繁出现这样的表述:在“公害”问题中,尽管“加害者”与“受害者”是非常明确的,但围绕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现象是“大规模的、复杂的和难以追究责任的”^[10]。正是要打破这种格局,饭岛伸子才把“地球环境”纳入“受害结构分析”而进行理论延伸,但是由于两者间的距离和对立,从而使结论略显刻板^[11-12]。在迫切的时代要求中,“受害结构分析”实际上成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那么,饭岛伸子的理论只是适用于解释已发生的公害中的“受害”吗?这样的看法将抹杀饭岛伸子所开创的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可能性。因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从事研究的饭岛伸子眼里,因“受害”和劳动安全事故引起的社会痛苦是真真切切的,她首先要面对的不是研究方法,而是研究对象。她选择“社会学”作为方法、将关切集中于“受害”的探索过程并非是直线式的,这恰恰是探讨其研究的意义出发点。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回顾,可以将饭岛伸子的视角及发现作为即使时代和事例相异也仍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东西而进行重新解读。

饭岛伸子在“受害”和劳动安全事故引发的社会痛苦的引导下,踏入了社会学中把握“受害”的研究领域。本文将通过追溯饭岛伸子的学术形成轨迹,来回答在环境社会学中何为“受害”,并进一步发掘饭岛伸子的分析视角所具有的潜在可能性^①。

二、关于社会学与“公害”的两个质疑

1. 作为社会学对象的“公害”

本节将首先对饭岛伸子之前的社会学与其硕

士论文的差异进行梳理。在她开始研究生生活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社会学的考察对象主要是阶层、集团、农村、城市等,而很少集中于特定的社会问题。例如,《社会学评论》杂志直到 1976 年才刊登了一期“生活环境破坏”专题。其中,河村望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支配破坏了劳动阶级及国民的生活并使之陷入危机”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公害和职业病的案例^[13];新睦人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将“生活环境破坏是生活环境系统的结构性破坏”这一命题当结论,对生活环境障碍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加以解释和定义^[14];而吉井博明则从社会工学的角度,把环境问题看做“有关价值选择与分配的问题”,并以垃圾处理设施及道路建设为例,论述了应对和回避纠纷的方法^[15]。

这三篇论文分别用社会学不同的“解剖刀”剖析了“生活环境破坏”这个对象。但是关于社会学为什么必须分析“生活环境破坏”以及社会学应该呼应的现实究竟是什么这两点,作者们都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些论文的着眼点主要是“理论”,而不是生活环境破坏的“现实”。

需要注意的是,河村望和新睦人的论文所使用的部分资料,都是依据饭岛伸子的论文。饭岛伸子后来曾说,那一期的专题研讨“给了自己莫大的鼓舞”^[8]。鼓舞大概并不是来自三篇论文在内容上有什么启示,而是自己研究“受害”的论文被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阅读引用的喜悦。那么,这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2. 发现“加害-受害”框架

在饭岛伸子 1965 年进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时,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其导师福武直以及岛崎稔、莲见音彦、松原治郎、青井和夫等人有关区域开发的论文。那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从前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尤其重视从阶级对立的框架来把握社会。例如,莲见音彦、

^①这是出于笔者对二战后日本有关“公害”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关注。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在产业发展的名义下生活受到威胁的人们,不断思考存在于社会和人心的歧视结构等问题,其中就有人将其表述为“公害”。但它后来出现的“环境问题”概念中没有位置,也很少被回顾。笔者认为,探寻饭岛伸子和宇井纯是如何被生活在非学术空间的人们所锤炼、在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中构筑自己的学问,与再次倾听那个年代“在野”的声音这一点是相通的。

松原治郎和青井和夫等将“区域开发的本质”视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机制的一个具体体现”^[16]。岛崎稔等则把群馬县安中地区的矿业污染理解为对农地的损害,并没有把受害方的农民视为受害者,反而因其缺少对矿业污染源的抵抗战略而予以批判^[17]。进而,高桥明善、园田恭一、古城利明等将静冈县反对在沼津、三岛和清水地区建设大型联合化工企业的运动解释为当地居民对国家、地方自治体的“地区性阶级统治”的抵抗^[18]。这些研究的共同模式是把事件背后的动力全部归结为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沼津、三岛和清水地区的居民运动被看做对这一体制取得“胜利”的案例,所以才引起了关注。

饭岛伸子的硕士论文《区域社会与公害》(1967年)^[19],以熊本县的水俣病事件和上述三地的居民运动为主要事例,在把握这些地区的已有研究和分析方法中,主要受到其导师福武直的影响,采用了区域社会结构分析。她认为,“公害问题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伴随的工业扩张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从中可以看到她与导师之间的继承性。

但是,饭岛伸子的论文与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也有着截然不同之处:她通过对“加害”与“受害”这种对立关系的分析,梳理了区域社会内外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

“受害”的发生和扩大不仅源于作为肇事者的企业,也涉及政府、财界、学界和媒体等很多主体。对于以“揭示公害的现实”为旨归的饭岛伸子来说,为了揭示那些仅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构图而无法呈现的现实,她需要有新的“主语”。她在论文中注意到,在公害问题发生时,构成区域社会的企业、居民、地方自治体及民间团体的反应各不相同。但与此同时,她把公害涉及的企业与居民分别看作“加害者”与“受害者”,并考察了“位于其间的自治体及各种社会团体”因选择站到“加害者”或“受害者”的一方而使区域社会出现对立的现象^{[20]29-30}。这也就意味着,“加害”和“受害”作为社会学分析概念的独立以及“加害者”和“受害者”作为主语的独立。这些概念以往并不是

社会学的用语,虽然在福武直的演讲中“受害者”概念也曾出现过两次,但基本上是“区域社会”和“居民”的另一种说法^{[20]203,215}。饭岛伸子论文的思想既非马克思主义也非功能主义,或许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学者们不分立场而加以引用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饭岛伸子的硕士论文具有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未见的独创性^①。

3.“灾害分科会”:质疑科学的场域

需要注意的是,在撰写硕士论文时,有关“受害”本身的厚重记述以及“健康破坏”这一概念并未出现。硕士论文的成功并不能让饭岛伸子满足,她在执笔时存在着另一个疑问:对于“公害”的受害者而言,社会学是否有用?

前文曾提到,饭岛伸子在进入研究生院之前参加了“现代技术史研究会”这一同仁组织的“灾害分科会”。在那里,熟知“受害”和劳动安全事故现场状况的技术人员和工会组织的相关人员讨论着科学家、技术人员如何避免扮演“加害者”的角色以及科学如何应对公害“受害者”等终极性的问题。在激烈的争论中,近乎初学者的饭岛伸子也被课以很高的要求,甚至难以完成的重任^[3]。例如,与会者对她的硕士论文就进行了如下批评:“公害是跨领域的学问,需要打破社会学的框框。应当构筑新的学术体系,希望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社会学”。乃至“所谓的社会‘学’能够成为在公害现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吗”^②?社会学的有效性完全没有保证的责任似乎应该由饭岛伸子承担。尽管她当时回应“我最想做的是运动分析和组织分析”,但仍然受到批判:“过分拘泥于社会学固有的概念和框架,你的论文难道不是仅仅停留在罗列式的记述吗”?与会者认为,饭岛伸子“未能鲜明地突出研究主题”,而主题理应是“运动的动态过程的规律化”^[21],饭岛伸子本人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指出饭岛伸子的研究主题不够鲜明可谓洞察尖锐。由于“灾害分科会”的成员们是与饭岛伸子

^①要强调的是,饭岛伸子对“公害”概念进行了慎重探讨,却对“受害(者)”和“加害(者)”未做任何说明。她被看做第一个将“受害”、“加害”引入社会学的人物,但可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

^②参见:现代技术史研究会编《会报》No.156(1969.11.20):5-6,署名“朝日奈”。

共同进行调查,并且从构思到写作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建议,所以他们的批判并非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而是一种促使其面向未来的鞭策。“灾害分科会”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源自“技术工作者的运动”的背景,他们都高度关注居民运动所需要的条件并抱有期待,似乎更倾向于进行运动分析和组织分析。然而他们在读了饭岛伸子的论文后发现,这方面的分析很是单薄^①。

尽管饭岛伸子受到了同仁们的强烈影响,但结果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不过,对“公害”的受害者来说“‘科学’意味着什么?”,与饭岛伸子本人的“‘主题’是什么?”这一问题紧密结合到一起,深深地印在了饭岛伸子的内心和脑海。不久,“主题”以饭岛伸子自己的话语得以表达,那就是“作为加害方的企业以及行政和学术都等闲视之的受害的问题”^{[1]78}。而促成这种表达的主要契机是 SMON 药害调查^②。

三、SMON 药害调查与社会学的“使命”

1.“全国 SMON 会”的请求

本节要论述的“SMON 药害调查”,是指饭岛伸子任助教的东京大学医学部保健社会学研究室接受日本厚生省的委托于 1970—1978 年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需要强调的是,这项调查并不是学者自发组织的,而是在患者团体的请求下开始的。

所谓 SMON 药害(subacute mydo-optico neuropathy,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炎)事件,是指患者因腹痛等原因而长期服用医生开具的含有奎诺仿剂的药物之后,引起失明、下身麻痹、发麻等神经性障碍的医疗事故。最初被发现是在 1955 年前后,但直到 1964 年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害者远远超过 1 万人,成为前所未有的药害事件^[22]。

然而,令受害者更为痛苦的是,SMON 曾经长期被误认为“传染病”。在原因被确定为奎诺仿剂之前,被诊断为 SMON 的患者,不仅受到家人、同事和邻居的疏远,甚至也遭到医院的回避,从而在偏见和歧视中度日如年。1969 年 11 月成立的“全国 SMON 会”会长相良丰光,曾经在翌年 5 月 11

日作为“参考证人”在日本众议院发表证言时强调,比疾病更严重的问题“是自杀,是社会排斥”^③。由于“传染病”说的疯传,不断有患者被逼到绝境而自杀。相良丰光提出了五点请求:在国会设立为审议 SMON 问题做准备的超党派恳谈会;在厚生省的“SMON 调查研究协议会”专门设立社会问题应对小组;重新研究据说每月高达 20 万日元的治疗费减免措施;成立以患者回归社会为前提的专门医疗机构;确保救济的法制化。

关于其中的第二点,在相良丰光到国会作证之前,全国 SMON 会就曾提出《关于设置 SMON 保健社会班(暂名)的请求书》(1970 年 3 月 13 日)。但由政府主导的追究 SMON 原因的行动长期停滞,直到 1969 年才成立了厚生省“SMON 调查研究协议会”,而 44 名成员基本上都是医学研究者,其中疾病组、病原组、病理组、临床组均把研究对象局限于身体病状。全国 SMON 会曾经呼吁:“新闻机构的煽动性报道成为自杀、离婚、离家出走、家庭不和、贫困、迷信等诸多病理现象的诱因,必须把这些现象当做社会问题来应对”^[23]。直到 1970 年 6 月,政府才正式决定在疾病组设立“保健社会学小组”。

2.饭岛伸子在调查中的作用

在被问询是否愿意加入疾病组时,东京大学医学部保健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宫坂忠夫教授最初持消极态度。而当时正在家休假的饭岛伸子给园田恭一副教授打了电话,建议接受这项工作,并表示在自己可以上班后非常想参与其中。在她看来,“保健社会学这门科学能够被当成拯救患者的心灵、生活甚至生命的使者而被选择”,对研究者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23]。

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保健社会学小组随后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调查,其调查概况见表 1。

^①饭岛伸子曾分析了“受害者运动”(1984 年),但重点是对运动史的记述。与此相对,现代技术史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在谈到“运动”时有着明显的实践取向:更关心如何发起运动或组织。

^②饭岛伸子在硕士论文执笔前曾到水俣市走访,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她独自进行长期访谈调查的信息。较为重大的调查是她与船桥晴俊等人一道实施的新潟水俣病事件调查。参见:飯島伸子,船橋晴俊.新潟水俣病問題:加害と被害の社会学[M].東京:東信堂,1999。

^③相良丰光的证言见 1970 年 5 月 11 日众议院社会劳动委员会议事录,http://kokkai.ndl.go.jp/。

表1 保健社会学小组的SMON药害患者调查

时间	调查事件	调查报告要点
1969.04	“SMON 调查研究协议会”成立	
1970.06	保健社会学小组成立	
1971.01—02	埼玉县户田·蕨·川口地区,冈山县井原市,患者107人	
1971.07	冈山县井原市(第2次)	调查结果证明了奎诺仿剂说
1972.03.25	SMON 调查研究协议会总结3年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病因为奎诺仿剂。	
1972.09	厚生省设立“特定疾病对策室”,SMON 调查研究协议会改为“特定疾病SMON 调查研究班”	
1972.12	德岛县德岛市,患者78名	
1973.05	德岛县德岛市(第2次)	
1974.01	冈山县井原市(第3次),患者68名+医生	
1974.09—10	埼玉县户田·蕨·川口地区(第2次),患者21名	
1975.01	爱知县,患者58名	首次提出救济对策建议
1975.04	重新解析调查所获数据	
1976.04.26	药害诉讼第51次辩论,饭岛伸子作为原告方证人出庭东京地方法院,就受害者遭受的损害作证	
1977.02	鹿儿岛县(鹿儿岛大学医学部并行昭弘协助),患者36名	
1978.01	新潟县(新潟大学医学部椿忠雄协助),患者39名	
1978.04	对所有调查过的地方进行问卷调查(邮寄)	依据生活实态调查提出救济建议

注:根据富士常叶大学附属饭岛伸子文库所藏的相关文献完成。

除了1975年与1978年之外,上述调查都是尽可能地以直接访谈患者的形式实施。要否定“传染病”说关键是证明奎诺仿剂说,1971年的调查就

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到了第二年的1972年3月,致病原因被确定为奎诺仿剂,判明病因的调查结束。但更为重要的是后来的调查,其他研究小组继续进行后续性的奎诺仿剂对动物影响的实验以及治疗方法和针对症状稳定者的康复性研究,而保健社会学小组的成员开始制作调查项目和问卷,走访医院、患者本人及其家庭,不仅对带回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而且基于口述记录和访谈印象等方式针对一些典型患者整理出个案报告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如下事实:离退休导致的收入减少和医疗费增加带来了经济贫困,而“传染病”说引起的人际关系恶化则使患者及其家人更加痛苦,并进而引起家庭不和。

1973年6月,东京地方法院开始审理以追究政府和制药公司责任为诉求的SMON药害案。与此相应,保健社会学小组在1973年以后提交的调查报告基本上都以对患者的访谈纪要为主要内容。其中1974年度的报告为针对埼玉县、爱知县的患者及其家人和遗属共101人的访谈记录,为此设定的访谈项目多达102项,旨在全面反映患者的病情、家庭生活和职业方面的变化。根据饭岛伸子的自述,其目的在于从接受治疗、回归职业、患者及其家人的受害这三个方面充分反映患者的生存境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包括治疗和救济在内的对策建议^[24]。重要的是,受害主体不只是患者本人,而是扩大到了家人(包括遗属)。顺便交代,当年的调查是在园田恭一到国外出差而由饭岛伸子主持的。

直接访谈法凸显了保健社会学小组的作用。医学研究者通常只关注患者的身体症状,而对于保健社会学小组的成员们来说,从患者的人格、职业、原有的人际关系到其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所立足的基层社区,都会进入他们的视野。保健社会学的视角为接近仅用医学手法难以发现的问题做出了贡献^①,它有助于捕捉从具体的生活层面来

①据矢野(1972年)介绍,在最初的2~3年间,直接与患者面谈存在着多重困难。在患者较多的井原市民医院,病历不公开,探视时间只有五分钟,而且因护士长在场难以听到患者的真实证言。当然,调查主体是官方的厚生省,以“全国SMON会”为首的患者团体又强烈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调查的实施。参见:矢野正子,スモン患者の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と看護,スモン調査研究協議会発行,スモン調査研究協議会研究報告書No.7・昭和46年度保健社会学部会研究報告,1972,95-103。

区分患者“受害”状况所必需的项目——诸如身体症状、日常生活、生活保障、医疗费用、社会歧视以及潜在患者的存在,并进而发现新的研究课题。

3. 倾听看不见的“受害”

对饭岛伸子来说,上述过程也成为审视“社会学”方法究竟是否对人们“有用”的场域。在年复一年地直接倾听当事人对“受害”状况的直接叙述中,这个最初有些抽象的问题逐渐变得具体化。下面让我们从相关年度的调查报告中由饭岛伸子单独执笔的“SMON 患者遭遇的社会歧视”^[25]以及“患者及其家人遭遇的损害”^[26]等报告来看看她的关注所在。

在第一个报告中,饭岛伸子讲述的不仅仅是“歧视”的存在,而且描述了歧视发生的具体过程,并进行了具体分类。患者遭遇歧视的场所包括家庭、社区、职场、医疗机构、自治体、学校等。要面对的流言不只是“怪病”,还有“狐狸精附身”、“恶性遗传”等。该报告基于 1972 年在德岛市的调查基础上完成,涉及的 78 位患者中有 64 人回答说“患病导致人际关系变化”,而变化的原因有 80%源自于“传染病”说,另外有 46 人表示为避免歧视而隐瞒了疾病。这份依据 32 名患者的个案整理而成的 20 页报告,非常详实地呈现了歧视的状况。

例如,在第 2 节“传染说引起的社会歧视之实况”中,饭岛伸子把歧视主体分为家人、亲戚、友人、同事、社区居民、同病房的患者,并分析了因顾忌他人而隐藏患病事实的案例。在“家人成为歧视者的情况”部分,有一位 1931 年出生的女性“因为 SMON 患者被人知道了不好,出嫁后被婆家改了名字”的例子,她在病发三年后终于迎来了“奎诺仿剂说”的定论而重新工作,虽然为麻木症状所困扰,但为了补充家计还是要勉为其难,而“媳妇”的角色所伴随的家庭地位低下使她加倍痛苦。在第 3 节“传染病说报道与医生的传染病主张的影响”中,则有如下事例:1909 年出生的女性被医生告知“因为传染,所以不能让你住院”,而她“一个女人独自拉扯大的儿子和媳妇也开始远离,自己成了孤零零的人”^[25]。此外,在第 5 节“源于不理解的歧视”中,讲述了 1919 年出生的一位匠人在

病发后失去工作、进而妻子跟好友私奔的例子,他虽然后来再婚,但他和他的母亲要依靠在工厂打工的第二任妻子养活,妻子的斥骂“到底哪儿不好?没用的东西!”让他深深叹息。

饭岛伸子的目光持续聚焦于“受害”中通常看不到的领域。她的笔致有这样的特征:在她感到一般人往往意识不到的地方会缓慢着笔,尽量详细地讲述。这些事例告诉我们,患者与总是被认为最亲近的血亲和配偶关系,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为此,家庭出现的不和成为了威胁当事人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因素。饭岛伸子是这样总结的:支撑着患者生活的人际关系一旦松动,带来的痛苦“丝毫不逊于身体的痛苦和经济的窘困”,而福利和医疗行政机构应该把“详细了解 SMON 患者所代表的……外观上很难理解的每一位身体障碍者的生存状态”当做前提。

这一问题意识在 1973 年的调查中再次呈现,“家庭”这一关系被纳入访谈中。下面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饭岛伸子的关心所在:

重症患者通常伴有失明、无法行走、语言障碍等第三者能够理解的身体障碍症状,至于中度和轻度症状患者,即使本人很痛苦,其身体障碍却经常不容易被第三者理解,这反过来会增加他的痛苦^[26]。

保健社会学小组的调查结果明确显示,SMON 药害患者所诉说的痛苦的原因并不相同。人的生活 and 尊严原本就是由当事人与他人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在支撑,当事人的痛苦很难仅仅通过身体症状来讲述。那么又该如何表达呢?在同一年,饭岛伸子将“因病发而承受的损害”细分为下列七项:①身体上的障碍;②身体障碍引发的日常生活障碍;③经济或财产损失;④职业方面的损失;⑤人际关系的恶化或破裂;⑥人生设计方面的损失;⑦精神上的受害。并且她论述了各项之间的关联,在结尾还添加了关联图示^[26],尝试通过叙述和图式,来充分揭示视觉无法把握的痛苦。

进而,当 SMON 药害诉讼进展到关于损害问题的审理阶段,饭岛伸子于 1976 年 4 月 26 日作为

原告方的证人出庭作证^①。而在此之前,面对即将开始的审理,“全国 SMON 会”的机关刊物《曙光》第 41 号(1976.02.01)在卷首呼吁:“将要迎来关于损害问题的审理。请做出能够载入我们的历史的举证”。诉讼的焦点围绕损害赔偿金额的多少而展开,但是却包含着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当事者背负的生活压力的历史。而饭岛伸子要做的是作为科学家去证明被深深地嵌入到生活史中的“受害”:陈述无辜的健康受损、人际关系破裂、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连为了维持生存而提出的最低要求都遭到歧视和拒绝的状况。基于多年的调查积累而证明了一个个患者“受害”状况的饭岛伸子,应该也找到了她当初面临的“自己的主题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

四、“受害”概念的适用性

1. 受害结构分析的目的和特征

通过 SMON 药害调查,饭岛伸子发现了受害者承受着不像身体障碍那样可见的障碍所带来的痛苦。而随着对 SMON 药害之外的多个事例的考察,饭岛伸子意识到,虽然致害的原因不同,但受害者的痛苦有相通之处^[27]。为了展现 SMON 药害事件中不可见的“受害”,饭岛伸子以图示说明,其中在 SMON 药害的“原因”中标有“奎诺仿剂的许可、制造、销售、处方”和“传染病说的发布、报道”^[26],而在随后的几篇相关著述^[27-29]中,相同的部分被省略。基于这些研究,加上在足尾铜山脚下松木村的事例调查中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受害”贯穿于整个区域社会,共同形成了“受害结构分析”。

那么,“受害结构分析”的意图何在呢?让我们回想起中村刚治郎(1996年)^[9]对饭岛伸子著作(1995年)的批评:“仅仅对研究对象进行论述并不能显示社会学独特的固有方法和体系”^[30]。这一批评在无形中指涉“受害结构分析”的目的。实际上,饭岛伸子的研究活动原本不是要创造一种能适用于其他事例的、可演绎推论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饭岛伸子一系列著述的特征是对个别事例的记述和图示的结合。在她发表于 1979 年的一篇论文的图示中,有如下阐释:

社会灾害的受害结构的特征是:从抽象的和量的方面来看有着共同性,从具体的和质的方面来看则显示出异常多样性。前者可以进行平面化的图示,也即予以普遍化,但后者却通常难以普遍化^[27]。

如同在 SMON 药害调查报告中所呈现的那样,直接面对“受害”的饭岛伸子首先进行的是对具体的、质性内容的记述,并进行了相应分类。从中固然归纳出了图示,但图示并不能说明一切。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图示是为谁而做的?饭岛伸子所面对的是调查组中的医学工作者、负责救济政策的厚生省以及审理药害诉讼的法官。她所归纳的七种相互关联的“受害”状况,也被纳入到厚生省 SMON 调查研究协议会的最终报告中,构成了“应及早采取措施”的依据^[31]。这反过来意味着,她需要超越对“受害”概念的专业性理解。

这一构图同样适用于“公害”和劳动安全事故。在“环境厅”设立之后,公害对策在表面上看来是被推进了,但在实践中,法律和医学界依然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才承认“受害”,从而将大量的受害者排斥在外,而且即便承认了“受害”,对受害者及其家庭以及逝者的遗属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和人生设计方面的严重不安也不会予以补偿。这些都让饭岛伸子转向对狭隘理解“受害”的批判,并且将研究发现概括为“受害结构分析”。中村刚治郎认为她“仅仅对研究对象进行论述”,但是她把“受害”当做研究对象,以超越社会学的方式而对“受害”的具体表现加以叙述,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状况的挑战和抵抗。

2. “加害-受害”研究的展开及相关问题

饭岛伸子在 1984 年的著作中系统总结了“受害结构分析”,其理论贡献已经被多次论及。被认可和赞赏的贡献包括“结构性地、综合地把握劳动安全事故和公害、药害的受害状况”^[32]以及从个人、家庭到社会,连续性地捕捉“受害”并深入到当

^①参见富士常叶大学附属饭岛伸子文库所藏文献“SMON 诉讼(昭和 48 年(ワ)第八七〇七·九四八〇·九四九一号)第 51 次口头辩论速记”。不过,在损害部分审理期间的 6 月 10 日,作为被告的三家公司突然提出申请和解的调解,部分患者接受了和解,其他人则继续诉讼。很难说原告方胜诉的判决(1978.08.03)反映了饭岛伸子和律师们多次强调的身体受害之外的社会·精神损害部分。

事人没有意识到的“受害”状况^[33]。当然也有批评,如说她只是把研究对象当做“受害者”看待,“没有全面把握受害者具有主体能动性或积极性的一面”^[2],这种批评可谓中肯。而针对“受害结构分析”提出后的研究状况,关礼子的提醒也很重要:“不是所有的劳动安全事故或消费者受害都经常成为区域社会的问题”^{[34]769}。

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转向 20 世纪 90 年代。在新生的“环境社会学”大潮中,饭岛伸子将她的根据地重新转到东京,并与同仁们一道展开了合作研究。其所用的案例也从日本国内拓展到了海外,例如,在澳大利亚,她又再次遇到了 1975 年对加拿大原住民的调查中曾经遇到的民族歧视问题。进而,她担负起了将新的学问领域“环境社会学”进行体系化的工作。为了应对“地球环境”这一热点问题的挑战,“受害结构分析”开始纳入“国际”、“地球规模”等关键词而加以拓展,并逐渐转变为“加害-受害关系”和“加害-受害结构”^[11-12]。在这个过程中,明确区分“加害”与“受害”而进行论述的倾向不断增强。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受害结构分析”逐渐进行着物理空间的“扩张”,或者说成了超越地理范围的概念。她在最初论述“公害”、劳动安全事故、药害之间具有共同性时,并没有对随着区域的扩大或不同而有何不同予以详细说明^[27]。在 1984 年的一项研究中,它被概括为一幅由工厂开始,然后依次向区域和全国拓展的同心圆般的画面^{[1]76}。到了 1993 年发表的《环境问题与受害的机制》一文^[11],开篇即说明了“受害范围的扩大”,具体分为六个阶段:从极小范围的“个体的生活”到“生活环境”、“区域环境”、“国家层次的环境”、“国家间的环境”到极大范围的“地球环境破坏”,而这种框架与九种“受害的严重程度”相交叉,构成了“受害的社会结构”^{[11]81-86}。进而,她在 2000 年的研究中针对国际规模的公害和环境问题的“加害-受害结构”进行了论述,从“高度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精英集团与非精英集团等视角出发,说明其间的“差距”是形成“加害-受害”结构的主要原因^[12]。

这些主张的意义在于,把多种多样的环境问题沿着其发生、扩展的轴线而加以整理和呈现,并且与各种“差距”联系起来进行论述。但是,正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所示的那样,本身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概念一旦被固定为“加害”与“受害”的主体,两者就会被割裂而转变为其他问题,其内涵也就又回到极其平面和刻板的印象。它可能忽视了原本存在着“加害”与“受害”是由谁来区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毋庸置疑,之所以将“加害-受害”的对立再次纳入“地球”、“人类”这样的宏大主语,目的在于对抗那些可能将责任暧昧化的论调^[12]。但是,将“受害”扩大当做地理概念,并将“加害-受害”关系用固定的主语来代替,那么饭岛伸子从 SMON 药害调查中发现的、仅仅用图示或记述都无法道尽的、看不见的“受害”的丰富内涵,就会被较少言及而变得干瘪。

饭岛伸子认为,作为“新型的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包含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感受到的大量的局面和现象”,而这正是该问题的难点所在^[35]。但即使如此,“地球环境热潮”的磁场极为强大,以至于任何人说起“环境”时都不能不意识到“地球”。她曾经指出,“就算是地球环境破坏这样极具全球性的问题,实际的受害者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某种人类群体”^{[11]83},她通过在海外实施的调查探索了接近这一问题的方法,但是中途就病倒了。为此,她只能姑且沿用抽象的对立轴来叙述“地球环境问题时代”的“加害-受害”关系。

五、饭岛伸子视角的普遍性

以上匆忙追溯了饭岛伸子探索自己方法论的历程。她是按照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顺序踏入“社会学”领域的,既吸收了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的视角,又沿着“加害-受害”的轴线深入描述了“公害”的现实,从而与体制还原论有着明显区别。进而以 SMON 药害调查为中心,对“受害”的内涵伴随着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增加而不断丰富的状况进行了长期考察。最终,她提出了“受害结构分析”,用来回应医学工作者和法庭等社会学的外部关于“社会学”的方法如何证明“受害”的问

题。但是,在理论化及其拓展的过程中,她也遇到了“加害”、“受害”概念简单化的困境。

那么,从饭岛伸子的思索轨迹中可以归纳出怎样的普遍性呢?围绕“受害结构分析”,关礼子曾经以水俣病事件中患者之间相互伤害的状况为例,指出有必要回避对“受害”的简单化理解^{[34]768-769}。在SMON药害事件中,虽然“受害”具有一定的区域集中性,但饭岛伸子的目光并没有被“区域”的框框所限制,而是集中凝视着“受害”本身。从中可以获得两点启示,用来展望饭岛伸子在其理论展开的过程中所面对的课题。

首先,即使在“加害者”与“受害者”区别不明显的情况下,饭岛伸子观察“受害”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透视“受害”的内涵。当她在SMON药害调查中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患者及其家人”时,她看到的“家人”并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明显的事实是:正是与家人这一最亲近的他者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细争执和摩擦,成为患者无法忽视的痛苦。饭岛伸子认为,在生活中派生出来的此类“受害”最终会引起“生活水平降低、人际关系恶化、生活设计变更”,这被看成“人作为人活下去的最重要的侧面”出现了破绽^[27]。其中的“生活设计”这一要素,饭岛伸子说是借用了“生活结构分析”^[36]中的概念,但在“生活结构分析”的框架中并不存在,而是她在借用时添加的。“人作为人活下去”的核心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还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产生的期待和愿望。“家庭”是生成期待与愿望的单位,其成员之间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而密不可分。因此,当“生活设计”受到某种威胁,就会出现彼此变成“受害者”的角色与“加害者”的角色,当然也就会带来新的痛苦。饭岛伸子所说的“受害结构”,本质上包含着对这种复杂关系的考察,而未必只是对应于“加害结构”。

其次,饭岛伸子的视角不只是适用于说明过去发生的事件或问题,而且也不会因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受限制。她基于大量调查而发掘出来的是“公害”、“环境”、“居民运动”这一脉络中未曾涉及的,对丰富的日常生活的愿望。在SMON药害调查报告中,她的叙述没有固定的概念,而只是呈现了具体的、个人的简单生活史、家庭构成和年龄

等,尽管如此,却充满了普通人“活着”的具体性,以至于能够让几乎所有的读者都很快联想到自己或周围某人的处境。也就是说,很难抽象化的现象却凸显了普遍性。当然,饭岛伸子的叙说还告诉我们,当原本正常的日常生活突然被外来的力量打破之后,便具有不可逆转性。

在回顾“公害”的历史时,自然科学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追究物理性的因果关系机制,却对深受其害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哪些方面受到影响等闲视之,这样的状况不断重复。即便“公害”的称呼不再被使用,上述状况恐怕也还会继续存在。然而,不论是什么样的事件和问题,不论用面积或受害人数等指标所反映的规模如何,“受害”始终是作为每一个当事人的日常体验而存在。即便在医学没有掌握和公布健康损害状况的阶段,“生活设计”的失去已经通向夺走人们生命的后果^①。

换句话说,本文认为,饭岛伸子的“受害结构分析”的生命力,恰恰是存在于她的理论化之前的著述,特别是在对个别事例的叙述中。“受害”一词的内部叠加着各不相同的人们多重苦恼。现在,当我们想象自己的生活会被某种力量所威胁时,饭岛伸子为揭示“受害”而持续进行的思索,将成为我们无法将其进行简单的一元化归纳的“窗口”。不仅是本文,对于多数读者而言,饭岛伸子的作品必将成为能够汲取普遍性——它超越了具体的案例和时代的源泉。

参考文献:

- [1] 飯島伸子.環境問題と被害者運動[M]. 東京:学文社,1984.
- [2] 早川洋行.ドラマとしての住民運動:住民運動の語り方と社会学者の役割[J].日本都市社会学年報,2004,22:105-119.
- [3] 友澤悠季.“技術者”から“公害”に出会う:

^①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造成了大范围的放射污染,因生活遭到破坏而自杀者,仅笔者所见的报道(2011年3月—2012年7月)在福岛县就有八例,而若把原因扩大到整个东日本大地震,仅内閣府掌握的就有16人。参见:内閣府自殺対策推進室発表資料.東日本大震災に關連する自殺者数.内閣府・政策統括官(共生社会政策担当).<http://www8.cao.go.jp/souki/notice.html>, 2012.

- 1960年代“災害分科会”の活動を中心に
[M]//帆足養右.日本及び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環境問題と環境問題の理論と調査史の総合的研究.富士:富士常葉大学,2007:45-59.
- [4]飯島伸子.公害問題は社会学の対象となる
[M]//佐藤毅ほか:社会学を学ぶ.東京:有斐閣,1970:90-91.
- [5]出版年鑑編集部.出版年鑑 1970[M].出版ニュース社,1971.
- [6]飯島伸子.公害・労災・職業病年表[M].公害対策技術同友会,1977.
- [7]米本昌平.地球環境問題とは何か[M].東京:岩波新書,1994.
- [8]飯島伸子.環境問題研究と社会学[M]//飯島伸子先生記念刊行委員会.飯島伸子研究教育資料集,1990:175-185.
- [9]中村剛治郎.飯島伸子著『環境社会学のすすめ』[J].環境と公害,1996,25(4):70.
- [10]吉原利一.地球環境テキストブック 環境科学[M].オーム社,2010:iii.
- [11]飯島伸子.環境問題と被害のメカニズム[M]//飯島伸子.環境社会学.東京:有斐閣,1993.
- [12]飯島伸子.地球環境問題時代における公害・環境問題と環境社会学[J].環境社会学研究,2000(16):5-22.
- [13]河村望.現代資本主義と国民の生活破壊[J].社会学評論,1976,27(2):2-20.
- [14]新睦人.「生活環境破壊」とは何か:環境社会学への方法論的序説[J].社会学評論,1976,27(2):21-56.
- [15]吉井博明.環境問題の新局面:“社会工学”的アプローチから[J].社会学評論,1976,27(2):57-75.
- [26]蓮見音彦.地域開発の虚構と現実 第一節 地域開発と社会変動[M]//福武直.地域開発の構想と現実Ⅲ:工業都市化のバランス・シート.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5:205-236.
- [17]島崎稔・金子載.鉦害問題の地域社会性[M]//島崎稔・美代子.安中調査と鉦害裁判.東京:礼文出版,2004:121-210.
- [18]高橋明善,園田恭一,古城利明.地域社会の理論と構造[M]//芥川集一.集団論.東京:青木書店,1965:173-242.
- [19]飯島伸子.地域社会と公害:住民の反応を中心にして[D].東京:東京大学,1967.
- [20]福武直.公害と地域社会[M]//大河内一男.東京大学公開講座 7 公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
- [21]菅竜一.災害分科会報告[R]//現代技術史研究会.会報,1969,147:2-8.
- [22]スモンの会全国連絡協議会.薬害スモン全史:全3巻[M].1981:5-48.
- [23]飯島伸子.スモンの社会学的側面について:2[J].全国スモンの会『曙光』第29号,1975:7-10.
- [24]飯島伸子.特定疾患スモン調査研究班保健社会学分科会研究報告書(昭和49年度)[R].1975:序.
- [25]飯島伸子.スモン患者の受けた社会的差別:大きかった感染説の影響.特定疾患スモン班保健社会学部会研究報告書(昭和48年12月)[R].1973:61-80.
- [26]飯島伸子.患者・家族の損害.特定疾患スモン調査研究班保健社会学分科会研究報告書(昭和49年度)[R].1975:18-28.
- [27]飯島伸子.公害・労災・薬害における被害の構造:その同質性と異質性[J].公害研究,1979,8(3):57-65.
- [28]飯島伸子.公害・環境破壊と国民の健康[J].体育科教育,1975,23(8):24-26
- [29]飯島伸子.わが国における健康破壊の実態:患者・国民サイドから[J].社会学評論,1976,26(3):16-35.
- [30]飯島伸子.環境社会学のすすめ[M].東京:丸善出版,1995.
- [31]飯島伸子,園田恭一,三浦文夫.スモン患者・家族の生活保障の必要性和早急にとられるべき施策[M]//厚生省特定疾患スモン調査研究班.

昭和 50 年度研究業績.1976:357-367.

[32] 原田正純.飯島伸子さんとの研究の軌跡 [M]//飯島伸子先生記念刊行委員会.環境問題とともに:飯島伸子先生追悼文集.2002:181-183.

[33] 堀川三郎.戦後日本の社会学的環境問題研究の軌跡[J].環境社会学研究,1999(5):211-223.

[34] 関礼子.被害構造論[M]//日本社会学会社会学事典刊行委員会.社会学事典東京.東京:丸善出版,2010.

[35] 飯島伸子.はしがき.講座環境社会学第 5 卷 アジアと世界[M].東京:有斐閣,2001:i-ii.

[36] 青井和夫.生活体系論の展開.青井和夫など:生活構造の理論[M].東京:有斐閣,1971:139-180.

How Sociology Proves "Victim " of Public Hazards: On Nobuko Lijima's Survey of SMON Victims

Yuzawa Yuki¹, Translated by GAO Na²

(1.Kyoto University, Tokyo 171-8501, Japan ;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retrospection on the academic study of Nobuko Lijima, one of the pioneers in Japan to research on public hazard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paper tries to define "victim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hen Nobuko Iijima started the related research, sociology has not yet formed methodology concerning "victims" of public hazards. Her academic studies on "victims" can be brief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period when she shuttled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Technology History", her investigation over SMON victims, and h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afte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as institutionalized. As early theoretical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Japan, Nobuko's "victim structural analysis" is often considered to confine to the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have already occurred. However, the paper holds that from her description of the "invisible" part of "victims", especially their pain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we can see the intertwined "harm" and "victim". This perspective highlights its analytical validity to those unrevealed physical harm, and potenti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ithout a region limit.

Key words: public hazards (*kogai*); pollution victims; victims; social disaster; Nobuko Lijima; environmental problems

【责任编辑:章诚】